

政府补贴促进企业创新的政策效应分析

丁丽芸^{1,2} 许航敏¹

(1.广东省财政科学研究所,广州 510030;2.华南师范大学,广州 510006)

内容提要:如何提高政府补贴的政策效应,有效促进企业创新,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关注的重要问题。在广泛研究基础上学者们认为现有补贴政策增强了企业的创新意愿,但未能激发企业的实质性创新。本文从现有研究结论出发,通过构筑政府补贴促进企业创新的系统框架,从理论上剖析政府补贴政策在促进企业创新方面的矛盾关系及其关键点,深入分析存在问题并提出针对性建议,以期实现企业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助推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政府补贴 政策效应 企业创新

中图分类号:F8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544(2021)06-0077-07

一、引言

创新理论最早由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于1912年提出,该理论不仅在经济学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也在哲学上展示出创新的实质及丰富内涵。进入新发展阶段,创新不仅在新发展理念中居于重要地位,而且成为我国“十四五”乃至更长时间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适应新发展阶段和新发展格局的需要,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成为政府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尽管从理念上和价值上全社会对创新的重要性达成了共识,但创新毕竟具有开放性、非线性、动态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从事创新面临较高的风险,尤其是原创性创新投入大、周

期长、风险高,具备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的企业并不是太多,这就需要发挥政府补贴作为“有形之手”的重要作用,帮助企业增强抵御创新风险的能力。

从政策实践看,政府补贴最初用于稳定物价和弥补企业亏损。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补贴逐步成为产业政策调控的手段之一,广泛采用支持企业创新。政策实施过程中,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思考和探索如何真正发挥政策效应促进企业创新。一方面,学者们围绕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开展了大量研究,认识到补贴政策促进企业创新效果不理想,但对其原因和传导机制的分析不够深入。政府部门也在探索如何提高补贴政策效应,如从事前到事后,采取竞争方式择优补贴对象等,但政策效应依然差强人意。因此,系统全面认识政府

[收稿日期]2021-03-22

[作者简介]丁丽芸,助理研究员,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许航敏,副所长,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财政政策、财政绩效、财政民主。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572061)、广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16A070705048)。

补贴政策效应,探寻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价值。基于此,本文在梳理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着重从理论层面构建分析政府补贴政策效应的系统框架,剖析存在问题和原因,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

二、文献综述

从现有研究成果看,学者们对政府补贴政策支持企业创新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现有研究取得的共识是,政府补贴政策主要通过发挥“杠杆效应”和“信号效应”来增加企业的研发投入。一是“杠杆效应”。政府补贴政策有助于推动企业内部增加研发支出,有效改善企业研发投入不足的问题(Griliches,1980;Greenwald and Stiglitz,1986),小企业表现尤为明显(Lach,2002;Gerhard et al.,2004)。政府补贴政策激发出技术创新投入的乘数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企业发展初期的研发资金瓶颈(周亚虹等,2015)。对澳大利亚、意大利、德国等国家的实证检验均支持了这个观点(Streicher,2004;Oliviero,2011;Bjor et al.2012)。从撬动的杠杆看,Almus 和 Czarnitzki(2003)发现,公共资金每增加 1 个百分点可刺激企业研发投入增加 4 个百分点。Streicher(2004)采用澳大利亚的数据检验发现,1 欧元的公共资金可以激发 0.4 欧元的企业内部研发投入。对我国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研究表明,政府补贴的杠杆效应显著,且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政府补贴的杠杆效果越来越好(廖信林等,2013)。二是“信号效应”。政府补贴政策多数时候并不具有普惠性,企业获得政府研发补贴本身就意味着对企业研发能力的肯定。政府补贴相当于释放出有利信号,代表得到政府补贴的项目或企业受政府重点关注且市场潜力巨大、品牌信誉良好,有利于吸引银行贷款和社会资金投入,从而提升企业资金保障能力(Meuleman and Maeseneire,2012)。

(二)政府补贴效应存在补贴强度的最优区间

什么样的补贴强度才能最有效促进创新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问题。毛其淋、许家云(2015)认为,对产品创新的政府补贴强度最优区间是 $[0.0009,0.0399]$,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就会抑制企业的产品创新。对研发投入杠杆效应的政府补贴强度为 $[0,0.0214]$ 时补贴效率最高,此时补贴强度每提高 1 个百分点,企业研发投入将增加约 26.58 个百分点,在补贴最优区间内,对民营性质、东部地区和高端制造业行业领域的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系数更高(张辉等,2016)。路春城、吕慧(2019)采用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得出的补贴强度最优区间为 $[0,0.0211]$,与张辉等(2016)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2005 年-2007 年的微观面板数据得出的结论非常接近。张杰(2020)基于 2008 年-2014 年全国企业创新调查数据库的企业数据,首次提出政府创新扶持补贴政策对民营企业的创新投入总体上呈现出显著的 U 型关系激励效应,这意味着政府创新补贴的规模必须达到一定临界值才会对企业创新投入产生挤入效应,否则就是挤出效应。

(三)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创新影响受到诸多条件制约存在不确定性

现有研究认为补贴政策能否转化为企业的创新产出,受到诸多条件制约。一是企业现有的研发资本存量和人员投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能否有效吸收和利用政府研发补贴(白俊红、李婧,2011)。二是政府补贴政策对民营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对要素市场扭曲程度低的地区促进效果更明显(杨洋等,2015)。对国有企业而言,补贴政策对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有显著的负向效应(曹平、王桂军,2018)。逯东、朱丽(2018)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促进了受支持企业的创新,但这一影响主要表现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国有企业,在非国有企业中并不显著。三是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考察发现,处于成熟期的企业,政府补贴政策对其研发创新存在显著激励效应,对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的影响较小(童锦治等,2018)。在约束条件

作用下,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创新数量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创新质量。学者们认为其原因在于政府补贴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信息不对称和寻租问题,当违规风险较低时,企业会策略性地满足政策门槛,获取政策扶持,获得更多财税补贴,却未必会真正开展创新或开展技术难度更大的实质性创新。杨国超等(2017)研究发现企业会通过会计科目调整或实际业务活动操纵增加研发投入以满足相关标准获得更多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但这并不能提高企业的创新产出。邢会等(2019)提出科技投入、人才投入和信息服务等供给面产业政策和政府采购、用户补贴、价格指导、应用示范等需求面产业政策促进了企业的实质性创新,而政府补贴、税收优惠、金融支持和知识产权等环境面政策却诱发了企业迎合性创新。

(四) 政府补贴政策因规模问题和资源错配对企业创新产生抑制作用

现有研究认为政府补贴政策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抑制作用。一是“挤出效应”。政府补贴会使私人资金从原有预支中挤出,当政府补贴达到一定规模时,继续增加补贴只会挤出企业自身的研发支出,抑制了企业创新(Boeing, 2016)。二是“供求效应”。政府补贴会扩大研发要素需求,在供给不变时导致企业研发成本上升,降低企业研发积极性,导致企业研发支出减少(Lach, 2002)。三是“诅咒效应”。政府补贴的“信号效应”会给鼓励性行业带来信贷、税收、财政补贴、土地、IPO 融资等资源,大量资金和企业进入,出现产能过剩、资源浪费(Brollo et al, 2013),降低企业创新激励和整体创新效率。四是“资源错配效应”。由于政府补贴存在一定的选择性,当生产要素从低政策支持力度但高生产率的企业流向高政策支持力度但生产率相对低一些的企业时,就产生了资源错置(张龙鹏、汤志伟, 2018)。

综上,政府补贴政策在增强企业的创新意愿方面作用明显,尤其是事前补贴有助于增加企业的研发支出,但这种增强效应更多地激发了技术含量偏

低的策略性创新,而对于真正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增加实质性创新的促进效果却差强人意。当存在信息不对称和寻租问题时,政府补贴政策甚至可能扭曲或抑制企业的创新行为,从而降低企业的创新能力。但专家们均是从不同角度来研究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效应,未从整体上分析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的机理和传导机制,因而难以提出系统性的解决思路。

三、政府补贴政策促进企业创新效应的理论分析

(一) 系统认识政府补贴促进企业创新的辩证关系

政府补贴政策促进企业创新是涉及到政府、市场和企业的复杂系统关系。作为政府调控的重要手段,政府补贴政策的目标就是落实新发展理念,提升全社会创新能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企业则是通过创新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获取更多利润,因而企业有着内生的创新需求,但创新能否持续,还要取决于创新转化为企业市场占有率和企业利润的提升。从内在逻辑和利益角度看,政府和企业创新上存在辩证关系:既具有统一性,即两者在创新发展上都能实现自身的利益目标,也有对立性,那就是在达致目标的过程中两者的利益并非始终一致,补贴政策的引导激励并不必然会转化为企业真正的创新行为和创新能力提升。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政策效应的大小。“效应”是从政策作用对象视角观察和评判政策效果,重在“应”字,也就是企业在政府补贴政策面前如何应对,如何反应以及应对和反应的程度等。形式上看,政府补贴政策对促进企业创新可能存在效应,但必须看补贴政策的引导激励能否真正影响企业创新的行为本身及其结果,如果是,才能真正促进企业创新,补贴政策效果相应得到实现。反之,补贴政策目标就难以实现,政策就难以奏效,补贴资金的效果也就会折扣甚至无效浪费。

(二) 准确理解政府补贴政策促进企业创新效应的内涵

从统一性角度看,政府与企业在创新上具有一致性,政府补贴政策目标的实现与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和有效创新产出的增长是内在的、一致的。政府补贴政策的目标和效果不取决于政策本身,而是决定于企业创新行为及其结果,只有企业响应政府补贴政策的引导激励,正确有效地实施创新并通过创新获取预期利益时,政策的目标才能顺利实现,政策效应越强,政策效果和企业的创新产出收益也就越大,政策支持企业创新也才更可持续。

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是否愿意持续开展创新取决于三个要素的综合权衡:创新意愿、创新能力^①和创新净收益。企业是否有创新意愿,源于企业对创新的预期收益和研发成本的比较,如果创新所取得的预期收益大于研发成本,创新净收益达到一定的规模和比例,企业就会有创新意愿。而创新净收益的预期,又跟企业的创新能力紧密相关,在研发

成本不变的前提下,创新能力越强,则创新成功率越高,预期收益越高。因此,创新意愿、创新能力和创新收益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企业创新的闭环。创新收益高低决定了企业是否有创新意愿,而创新收益高低又受制于企业的创新能力。取得创新收益后,企业有能力购置研发所需要的生产要素,又能够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强化创新意愿。企业要取得创新成功,三个要素相互作用,推动企业不断创新。政府补贴政策作为外在因素,是企业创新行为改变的条件和激发因素,其机理在于通过影响企业创新三要素,引导和激励了企业创新的内部循环。首先,政府补贴政策以税收优惠、奖金补贴等方式体现了直接降低企业研发成本、提高创新净收益的作用。其次,政府补贴政策通过“杠杆效应”“信号效应”为企业吸引融资、人才等生产要素提供有利条件,间接提升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创新净收益和创新能力的双提升能进一步强化创新意愿,从而不断加大投入提升能力,形成良性循环(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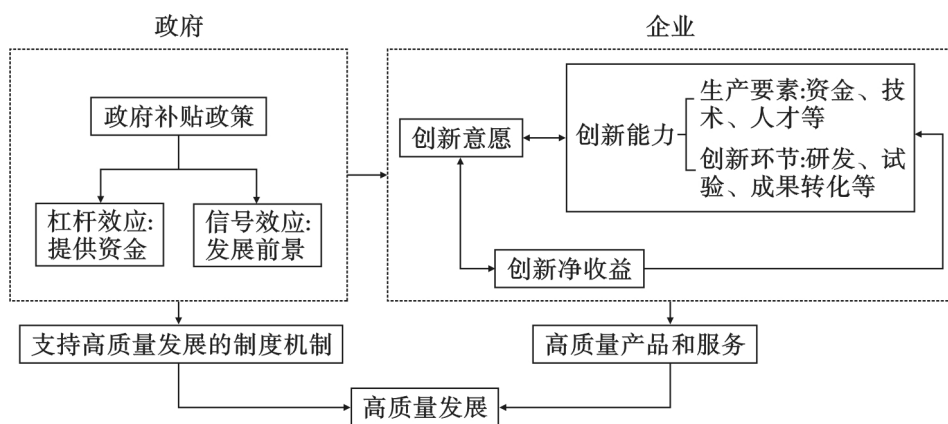


图1 政府补贴政策促进企业创新效应的系统框架

从对立性角度看,政府补贴政策并不必然会转化为企业有效的创新行为,也就是说政策的效应并不会自动实现。被补贴企业对补贴政策的敏感性,是补贴政策能否实现目标的重要决定因素。企业在不具备创新能力或者创新行为不能转化为企业创新能力的增强、市场占有及利润增长时,企业创新会变得无利可图或不可持续,但为了获取政府补贴

这块“馅饼”,就会迎合政府需要,搞形式上的创新,这个时候,补贴政策也引导企业行为发生了改变,但这并不是政府期望企业有效创新的行为,而是变成了扭曲的结果,偏离政府的初衷,政策目标就难以实现。政策失效不仅意味着政策不能发挥促进企业创新的应有作用和财政投入的浪费,而且还会扭曲企业创新行为给高质量发展造成负面影响,损害政府政策的威信。

从补贴政策的系统框架看,把握其效应需要关

^①创新能力,是指企业具备了创新所需要的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并有效利用,开展研发、试验取得创新成果并进行转化的能力。

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科学甄别创新的类型和质量。在经济赶超阶段,低质量的创新可以成为经济增长动力,但是对我国现阶段的经济水平而言,如果继续保留大量的低质量创新将有碍国家创新水平的继续提升。比如,我国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数量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从2001年的44.94%上涨到2015年的93.55%,几十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对发明专利引起挤出效应,几乎陷入“实用新型专利制度使用陷阱”(毛昊等,2018)。这就需要引起政府部门的注意,对不同历史时期、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地区的补贴对象要有所区分,支持适应当地经济发展的创新类型。二是准确评估真实的创新意愿。企业的创新意愿受制于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创新净收益。如果一个企业自身创新能力薄弱,明显难以取得创新成功,却有强烈的创新意愿并申报政府补贴,那么政府就需要甄别是否出现了“骗补式创新”,即企业以创新的名义申请补贴而实际并不开展创新。三是找准影响创新能力的关键薄弱环节。企业创新的三个要素中,政府补贴政策并不能直接作用于企业创新意愿,而是通过直接影响企业创新净收益和间接影响企业创新能力来影响企业的创新意愿。对不同的企业而言,其创新的薄弱环节不同,比如有的企业开展基础研究缺乏的是资金,有的企业缺的是技术,有的企业缺的是人才等。政府补贴政策应该出台有针对性的补贴措施,比如对基础研究类型的创新是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对缺乏相关技术人才的行业则采用人才引进优惠措施等方式,才能帮助企业补齐短板,更好地提升创新能力。四是加强对政府补贴的绩效管理。政府的资金来源于税收,政府资金的使用绩效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创新本身周期长,不确定性大,不能简单以短期成效作为绩效目标,应对补贴资金的用途进行追踪,合理设置中长期绩效目标,加强实地考察,避免企业舍本逐末,通过会计科目造假等方式形式性应付财政部门的绩效评价,不将精力放在通过补贴资

金的有效使用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上。

(三)从政策效应视角看当前补贴政策效果

从理论研究角度看,学者们的研究对政府补贴政策影响企业创新的传导机制、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和内部运行缺乏深入分析,对补贴政策的机制设计探讨也较少。原因在于专家们对政策效果和政策效应未做区分,直接从企业行为及其结果的角度来分析评判政策效果,而实际上补贴政策的效果取决于政策效应,因为政策施行到政策目标实现之间存在传导环节,需要企业产生真正创新的行为,而且企业本身也具有创新的内在需求,政策的关键在于使政策信号与企业的创新行为相叠加,否则政策的引导激励最终会落不到实处。企业创新被学者们当成一个“黑箱”,更多是从外在和结果角度来度量,缺乏深入分析导致学者们难以针对关键问题提出提升系统性和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

从政策实践角度看,当前政策效应的不强影响了政策效果的实现。一是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支持力度不足。政府补贴政策达到目标,要筛选出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或潜力大)兼具的企业加以补贴,并且要落脚至企业创新能力的要素,如资金、技术、人才及其有效运用上。但现有政策主要是释放“信号效应”,激发了企业进行相对投入小、周期短、风险低的策略性创新,对更需要政策扶持的实质性创新识别不足。如我国专利申请数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但发明专利申请占比较低、高质量技术创新较少。1978年到2017年,我国申请专利中发明专利仅占35.53%^①,远低于美国的90.43%、英国的72.27%、日本的82.92%和德国的80.5%。二是政府补贴的对象筛选机制不合理,加剧了企业创新的“马太效应”。目前,我国政府补贴种类繁多、标准各异,既有事前补贴,也有事后补贴。事前补贴基于补贴对象以往的成果,而事后补贴更是基于企业创新成功后才予以补贴,起到的只是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不利于激发更多的企业进行创新,造成创新者的垄断地位,不利于加快全社会的创新步伐。三是对政府补贴的绩效管理不到位。

^①数据来源:智慧芽(PatSnap)全球专利检索数据库分析报告 https://www.sohu.com/a/386777364_116513。

现有的绩效评价强调目标、指标,忽视主体行为及努力结果,不适用于不确定性强、周期长、成效存在滞后性的创新的绩效管理。目前,政府补贴监管注重审核申请主体的资格和流程,绩效尚未完全纳入考虑范围。部分纳入绩效管理范围的也只是考核补贴的杠杆效应、乘数效应和社会资本投资拉动情况,对创新产出和效应则鲜有涉及。以近年来兴起的科技创新券为例,自设立以来,创新券作为政府购买服务和财政补贴的政策工具,得到多地积极实行,在各省市区公布的创新券管理办法中,仅有少部分提及创新券的绩效评价,并将评价结果作为企业继续申请科技创新券的参考依据或以后年度预算的重要依据。而更多的省市在管理办法中关于创新券的监督管理只提及不得转让、赠送、买卖等,在申请中不得提供虚假信息或虚构创新券合同等内容,主要是针对申请者的资质真实性、有效性进行规范,没有对创新券的绩效进行追踪。

四、政策建议

在系统全面准确认识政府补贴政策促进企业创新效应基础上,要进一步坚持问题导向,让企业创新行为之“应”更最大限度地响应政策补贴政策之“导”,从而使得政府与企业在创新上同频共振,实现政府政策的效果和企业发展的效益双赢,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

(一)准确认识补贴政策对促进企业创新的政策边界,以支持实质性创新为落脚点提升政策精准度

理清政府补贴政策的边界,加大对基础性研究、实质性创新的支持力度。经过改革开放后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我国当前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迫切要求有高质量的创新作为支撑。对外观设计、实用新型等技术含量相对偏低的创新应由企业自主开展,对技术含量较高的发明创造应加大补贴力度,着重扶持企业的实质性创新,尤其是对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的扶持力度应大大加强,才能有助于企业提升创新能力,从本质上解决“卡脖子”问题。

(二)优化补贴对象筛选机制,激发更多企业开展创新,提升补贴政策的规模效应

创新能力较强的大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确实起到一定的带动引领作用,但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现代化产业体系作支撑,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成需要各行业、产业链各环节大量企业的创新和转型升级才能实现,并不是依靠少数创新能力较强的大企业就能够完成的。因此,政府补贴的对象不能局限于已经取得创新成果的企业,更要关注那些有创新意愿但暂时不完全具备创新能力或没有创新成果的企业,让这些企业在资金等方面得到助力,引导更多企业加入到创新大军中,支持创新型中小微企业成长为创新重要发源地,形成创新的“百花齐放”,这样对于已有创新成果的企业而言也起到鞭策和竞争作用,有利于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

(三)建立健全政策绩效管理体制机制,实现政策效果与效应的最佳融合

一是加强全流程政策绩效管理。建议从补贴政策出台,到补贴标准、方式、对象、成效都予以公开,便于社会监督。同时,应加强理论研究成果与实践评价结果的结合应用,对用于研发、环保、扶贫等方面的政府补贴绩效评价应考虑到资金投入和实际成效之间存在滞后性的问题,合理设定中长期绩效目标,避免短视行为。二是坚持因地制宜强化政策执行管理。在申报补贴资金时可由相关企业自定目标,自我承诺,并在补贴资金使用过程中加强过程管理,督促被补贴企业按照实施计划和实施方案履行承诺,按照预定的方式方法落实进度,切实将补贴资金的使用转化为自身创新能力的提升。三是创新政策评估方式方法。引入专家评价和政策受益群体来评价政策的质量,使内部评估和外部评估相结合。政策实施后由被补贴企业开展内部评估并剖析问题和查找原因。针对被补贴企业的内部评估报告,引入政策对象、专家学者、公众三方进行论证,并将政策受益对象的反应和没有享受到政策受惠对象的意见等综合起来,最后形成一个总的评价报告,帮助企业不断提升补贴资金使用能力水平,以创新效果促进政府政策效应和效果的有机融合。

参考文献:

- [1] Almus M, Czarnitzki D. The effects of Public R&D Subsidies on Firms' Innovation Activities: The Case of Eastern Germany[J]. Journal of Business & Economic Statistics, 2003(2): 226-236.
- [2] Bjorn A, Timo M, Janina R, Gerhard U. Does Firm Size Make a Difference? Analy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R&D subsidies in east Germany[J]. German Economic Review, 2012(2): 174-195.
- [3] Boeing, P. The Alloc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China's R&D Subsidies—Evidence from Listed Firms [J]. Research Policy, 2016(9): 1774-1789.
- [4] Brollo, F., T. Nannicini, R. Perotti, and G. Tabellini. The Political Resource Curs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3(5): 783-794.
- [5] Gerhard S, Schibany A, Gretzmacher N. Input Additionality Effects of R&D Subsidies in Austria: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Firm-level Panel Data[R]. Technology Information Policy Consulting, Vienna, 2004.
- [6] Greenwald, B.C., and J.E. Stiglitz. Externalities in Economie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and Incomplete Market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6(2): 229-264.
- [7] Griliches, Z. R&D and the Productivity Low Down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0(2): 343-348.
- [8] Lach S. Do R&D Subsidies Stimulate or Displace Private R&D Subsidie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a Micro-econometric Evaluation Studies[J]. Research Policy, 2002(29).
- [9] Meuleman M, Maeseneire W D. Do R&D subsidies affect SMEs' access to external financing? [J]. Research Policy, 2012(3): 580-591.
- [10] Oliviero A C. R&D Subsidies and Private R&D Expenditures: Evidence from Italian Manufacturing Data[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Economics, 2011(4): 419-439.
- [11] Streicher G, Schibany A, Gretzmacher N. Input Additionality Effects of R&D Subsidies in Austria: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Firm-level Panel Data[Z]. Vienna: TIP Working Paper No. 04-03, 2004.
- [12] 白俊红, 李婧. 政府 R&D 资助与企业技术创新——基于效率视角的实证分析[J]. 金融研究, 2011(6): 181-193.
- [13] 曹平, 王桂军. 选择性产业政策、企业创新与创新生存时间——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经验证据[J]. 产业经济研究, 2018(4): 26-39.
- [14] 廖信林, 顾炜宇, 王立勇. 政府 R&D 资助效果、影响因素与资助对象选择——基于促进企业 R&D 投入的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 2013(11): 148-160.
- [15] 路春城, 吕慧. 财政补贴促进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吗——基于 2008—2016 年上市公司的门槛效应分析[J]. 宏观经济研究, 2019(8): 94-103.
- [16] 逯东, 朱丽. 市场化程度、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J]. 产业经济研究, 2018(2): 65-77.
- [17] 毛昊, 尹志锋, 袁张锦. 中国创新能够摆脱“实用新型专利制度使用陷阱”吗[J]. 中国工业经济, 2018(3): 98-115.
- [18] 毛其淋, 许家云. 政府补贴对企业新产品创新的影响——基于补贴强度“适度区间”的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 2015(6): 94-107.
- [19] 童锦治, 刘诗源, 林志帆. 财政补贴、生命周期和企业研发创新[J]. 财政研究, 2018(4): 33-47.
- [20] 邢会, 王飞, 高素英.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促进企业实质性创新了吗?——基于“寻租”调节效应的视角[J]. 产经评论, 2019(1): 86-99.
- [21] 杨国超. 回应“产业政策之争”——基于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操纵现象的微观证据[J]. 清华金融评论, 2017(12): 103-104.
- [22] 杨洋, 魏江, 罗来军. 谁在利用政府补贴进行创新?——所有制和要素市场扭曲的联合调节效应[J]. 管理世界, 2015(1): 75-86.
- [23] 袁建国, 后青松, 程晨. 企业政治资源的诅咒效应——基于政治关联与企业技术创新的考察[J]. 管理世界, 2015(1): 139-155.
- [24] 张海洋. 中国省际工业全要素 R&D 效率和影响因素: 1999-2007[J]. 经济学(季刊), 2010(3): 1029-1050.
- [25] 张辉, 刘佳颖, 何宗辉. 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门槛分析[J]. 经济动态, 2016(12): 28-38.
- [26] 张杰. 政府创新补贴对中国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基于 U 型关系的一个解释[J]. 经济动态, 2020(6): 91-108.
- [27] 张龙鹏, 汤志伟. 产业政策的资源误置效应及其微观机制研究[J]. 财贸研究, 2018(12): 1-13.
- [28] 周亚虹, 蒲余路, 陈诗一, 芳芳. 政府扶持与新型产业发展——以新能源为例[J]. 经济研究, 2015(6): 147-161.

【责任编辑 孟宪民】